

# 南宋時期的出版市場與流通空間

## ——從科舉用書及醫藥方書的出版談起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 提 要

在南宋史的研究上，南渡後的宋朝雖是一個積弱偏安的政權，然在文化與藝術領域卻展現空前的生命力。當北方接連遭受外族入侵的兵燹摧殘，使得政治混亂、經濟蕭條；而南方相對地處於穩定發展的格局，甚至奠定日後扮演文化領導的角色，其中尤以行在所臨安為中心的兩浙路地區，無疑是南宋經濟與文化的領導重心。文學與藝術的繁榮，及學術思想的活躍，不能不歸功於紙張使用與印刷技術的發展成熟，而書籍出版普遍，知識不再侷限於少數人之手，因此形塑出一個文風興盛的趙宋王朝。假如說文化力量是推動國家社會發展的基礎，那麼與文化政策習習相關的書籍出版與印刷事業，則又將是審視其中的重要指標。

以往討論有關南宋的書籍出版，大多著重於版本、校勘、內容或裝幀等範圍。然而，隨著新文化史風潮的影響與衝擊，近年來學者研究南宋書籍時逐漸朝向多元視角，例如從商業史的角度來討論宋代刻書產業的發展、從傳播學的分析探討宋代書籍傳播與流通問題，及汲取社會史觀點討論書籍與士人群體、地域社會以及書籍版權意識等課題。

有鑑於此，本文擬以前人論著成果為基礎，依據版本學研究初步審視宋代書籍的出版狀況，並查找南宋文史著述、文人筆記、《宋會要輯稿》，及《全宋文》等書所收出版資料，兼採文集及藏書目錄等相關記錄。從中擇取南宋之際出版數量較多的二種書籍類型，即科考用書及醫藥方書為例進行分析，試圖探討南宋書籍出版地域與市場之間的關聯性，進而討論其中引發的問題。

**關鍵詞：**南宋、出版文化、書籍流通、科舉用書、醫書

## 一、前言

在南宋史的研究上，南渡後的宋朝雖是一個積弱偏安的政權，然而在文化與藝術領域上卻展現空前的生命力。當北方接連遭受外族入侵的兵燹摧殘，使得政治混亂、經濟蕭條；而南方則相對地處於穩定發展的格局，甚至奠定日後扮演文化領導的角色，其中尤以行在所臨安為中心的兩浙路地區，無疑是南宋經濟與文化的領導重心。<sup>1</sup>文學與藝術的繁榮盛況，以及學術思想的活躍，不能不歸功於印刷技術與紙張的發展成熟。書籍得以普遍出版，知識不再侷限於少數人之手，教育普及的結果，更形塑出一個文風興盛的趙宋王朝。<sup>2</sup>假如說文化力量是推動國家社會發展的基礎，而與文化政策習習相關的書籍出版與印刷事業，則又將是審視其中的重要指標。<sup>3</sup>

南宋時期，政府對於文化政策與出版活動的態度，對當時書籍的生產與流通實有密切的關連性。因此，近年來有關南宋史的研究，不論是從學術思想、科學文化、文人著作等個別或整體的討論，都可以看出研究者對於書籍的出版、銷售及流傳等歷程，已經從靜態式的描述，逐漸轉向於著重書籍流動的「書籍史」方面探討，而成爲一門重要的課題。<sup>4</sup>

以往討論有關南宋的書籍出版，大多著重於版本、校勘、內容或裝幀等範圍。確實，書籍從出版到流通的過程中，此種靜態式研究確是了解書籍史所必須下的基礎功夫。<sup>5</sup>故而，截至目前爲止，關於版本方面的研究仍是宋代書籍史的研究主流；然則，隨著新文化史風潮的影響與衝擊，近年來學者在研究南宋的書籍時，也逐漸

---

1 有關南宋文化在宋代文化的地位，參見劉子健，〈略論南宋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兩宋史研究匯編》；何忠禮，〈略論南宋的歷史地位〉，頁 72-79；王國平，〈以杭州（臨安）為例還原一個真實的南宋——從「南海一號」沉船發現引發的思考〉，頁 5-34。

2 對於南宋時代文化的描述，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即曾提到：「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見朱熹，《楚辭集注》之《楚辭後語》卷六，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相關討論見程民生，〈宋代社會自由度評估〉，頁 27-40。

4 黃寬重，〈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向〉，頁 137-152；沈宗憲，〈近三十年來兩岸學者有關宋代文化史研究之回顧——以印刷圖書、文化交流為例〉，收入劉德美等主編，《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學術論文集》，頁 291-312。

5 南宋書籍版本研究的論著相當豐富，其提供後人在歷史研究與發掘史料上貢獻匪淺。茲舉數例如下：日本帝京大學尾崎康教授，《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 2 章，〈南宋版本研究〉，頁 29-60，以及〈宋代雕版印刷的發展〉，頁 167-190；昌彼得、吳哲夫教授等著，《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李致忠，《宋版書敘錄》；陳先行，《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李偉國，《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下編，〈宋代史籍、類書等考論〉，頁 151-283；以及李明杰，《宋代版本學研究——中國版本學的發展及形成》等。

朝向多元視角加以探索，例如從商業史的角度來討論宋代刻書產業的發展、<sup>6</sup> 從傳播學的分析探討宋代書籍傳播與流通問題、<sup>7</sup> 以及汲取社會史觀點討論書籍與士人群體、地域社會以及書籍版權意識等課題。<sup>8</sup>

其中，前人論著成果之版本學研究，對於本文審視宋代的文獻資料，以及瞭解書籍出版的時間差有極大幫助；而新的研究領域，則對書籍出版與傳播動態研究提供更寬廣的角度及視野。然而，令人更好奇的是，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產物，南宋時期書籍的出版性質與市場取向之間究竟有何種關係？背後的文化成因與時代影響性又將是如何？換言之，南宋書籍出版究竟反映出何種的社會文化面相？這是個龐大複雜的問題，也是本文期待深入探究的部分。

眾所周知，南宋政府延續自古以來重視文人的傳統精神，從科舉取士與重文重儒的政策成為朝廷基本治國方針便可知，然而，官方的出版政策對於民間出版市場究竟是助力居多，抑或主要在防範禁止？另一方面，立足於長江以南的政權，在面臨與以往不同的氣候，或面對各種風土疾病時，醫書的刻印便成為突顯南宋政府在面對新環境、多變氣候下的新課題。針對政府面臨的難題，南宋時代出版市場又如何迎合社會的需要，開拓銷售與流通的市場？這些都是以往相關課題中較少注意的範圍。

有鑑於此，本文試圖以南宋文史著述、文人筆記，以及《宋會要輯稿》、《全宋文》等所收南宋出版資料作為研究對象，兼採個人文集及藏書目錄等相關記載，從中擇取南宋出版數量較多的二種書籍類型，即科考用書及醫藥方書主題為例進行分析，從中探討南宋書籍出版地域與市場之間的關聯性，並討論其中引發的問題。

---

6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張詔祁，〈論宋元兩代書賈的行銷策略——以《書林清話》、《書林餘話》內容為範圍〉，頁 15-30；李傳軍，〈南宋出版業的經營策略與文化傳播——以南宋臨安棚北大街睦親坊陳宅書鋪為中心〉，頁 47-51。

7 相關研究可參考南京大學鞏本棟教授以傳播學角度深入討論宋人出版文集情況，見《宋集傳播考論》；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頁 171-210。

8 除前引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一書外，參見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其他課題分別參見徐楓，〈論宋代版權意識的形成和特徵〉，頁 151-156；祝尚書，〈論宋代的圖書盜版與版權保護〉，頁 77-87；林拓，〈福建刻書業與區域文化格局關係的研究〉，頁 51-56；至於近年來日本出版史學者名古屋大學井上進教授的相關研究更是廣受注意，參見氏著，《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

## 二、科考用書的出版與流通空間

南宋時期的科舉考試，雖是延續隋唐科舉而來，但歷經數百年的積累，影響層面深遠廣大，自不待言。其中，因應科舉考試而出版的考試用書，其數量之盛、種類之多，不僅難以數計；再者，歷來相關研究科舉者甚多，加以此非本文闡述重點，暫且略而不談。此節欲透過南宋時期從官方到民間因應科考用書的出版態度，探索科考前後官民編印書籍的出版市場與流通空間。

科考制度發展至南宋已相當成熟，上至政府，下至學子，以及民間出版商爲了科考的書籍市場，莫不絞盡腦汁。對政府而言，南渡之初由於國力艱難，直到紹興末年，才開始國子監的刻書工作。而在強調以文治國的政策下，剛開始主要是以經、史類書籍爲主。據載當時的國子監「所取諸書多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三史無《漢》、《唐》。二十一年（1151）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蓋不惜也。』繇（由）是經籍復全。」<sup>9</sup>

一直到南宋孝宗即位，國子監刻書功能才漸入正軌，許多跟科舉考試相關或經世致用的經、史類書籍，相繼版刻問世。<sup>10</sup>像是常常被提到的科舉參用韻書《禮部韻略》，便是在北宋仁宗時由丁度奉敕編纂，於景祐四年（1037）交由禮部頒行，爲學子考試使用的官韻範本。在此期間也不斷有人對其進行修補。<sup>11</sup>到了南宋時期，先是紹興十一年（1141）有福州進士黃啓宗上奏《補禮部韻略》，<sup>12</sup>然所增不廣，尙多闕遺；其後，高宗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下詔令國子監印造《禮部韻略》諸書，以供省試、太學、國子監公試之用；<sup>13</sup>之後又有紹興三十二年（1162），由衢州免解進士毛晃進呈《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圖1）。是書乃毛晃、毛居正父子將家藏原稿增修補註之後，交由國子監刊行的本子。<sup>14</sup>從紹興末至嘉定十六年

9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4，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10 國子監所刻印書籍，多爲宣傳思想的儒經、正史和欽定書。其中，科舉考試所用的圖書，亦多由國子監刊印。參見顧宏義，〈宋代國子監刻書考論〉，頁41-46。

11 李子君，〈《禮部韻略》在宋代的流布〉，頁92-97。

12 歐陽德隆撰，郭守正增修，《紫雲先生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卷首，〈韻字沿革〉，宋理宗年間建陽刻本。

13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省試等令印造禮部韻略諸書詔〉：「今後省試、太學國子監公試發解及詮試刑法，令國子監印造《禮部韻略》、《刑統》律文、《紹興敕令格式》，並從官給。」載徐松，《宋會要輯稿》，第67冊，職官13之10，頁2669。

14 毛晃（1124-?），字明叔，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紹興末免解進士。見毛晃，〈擬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云：「竊見方今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收，僅

(1223) 期間,《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實已取代《禮部韻略》而成爲官方出版的韻書定本。後來,又有由民間書坊刊刻的《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這類韻書出現。<sup>15</sup> 而這些不斷修訂出版的官方或者坊間韻書,都代表南宋學子面臨科舉考試時對於用韻參考書的大量需求。

隨著政權逐漸穩定之後,政府開始重視經、史書籍及科考用書的出版。除力求國子監刻本做到精美良善、校勘嚴謹之外,同時鼓勵公使庫、轉運司、漕司、郡州縣學等地方機構自行出版書籍並予定價,以自營自銷的方法,補貼經費不足的情況。像是宋淳熙間(1174-1190)撫州(今江西)公使庫刊行的《春秋經傳集解》(圖2),正是來自公使庫出資刊印的官方書籍。<sup>16</sup> 而此種鼓勵地方機構自營自銷書籍的政策,對刺激民間刻書事業的發展無疑有正面的意義。

以臨安府地區的私人書坊爲例,在因應科舉考試及商業營利的考量下,刻書數量及品質上並不比官方遜色。根據張秀民、韓琦等學者就南宋臨安的私家書坊數量及分布情況研究指出,當地可考書鋪有20家,<sup>17</sup> 其中著名者如臨安府柵北睦親坊南的陳宅書籍鋪、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橘園亭文籍書房等,在當時俱頗富盛名。在官方重視編校經、史類書籍,積極出版與科舉相關教科書或參考書之餘,也吸引更多的坊間書鋪投入刻書事業。

由於政府機構與民間出版商都有刻印經、史書籍或科考用書,因此,在面對科舉考試用書的出版上,官方與民間的立場歧異,是自然的現象。只是官方的態度或堅持究竟爲何?而民間出版商又有何對策,如何因應?這無疑是在出版科考用書時最令人困擾,也最難解決的問題。本文擬針對科舉考試用書的用途,依照考試逼近的時間先後,略分成二大類型:一爲迎合考生閱讀背誦的考試用書;二爲臨近考場

---

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尚多闕遺。……故以十年之力,增修四聲之譜,……臣所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總平、上、去、入四聲,共計五卷,謹繕寫新本,裝成五冊,隨表昧死詣登聞檢院投進以聞。如蒙可采,乞頒下國子監雕印施行。……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日,衢州免解進士臣毛晃上表。」載《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卷首,宋嘉定十六年(1223)國子監刊本。

15 李致忠,〈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載《宋版書敘錄》,頁306-311;另見李子君,〈《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版本考述〉,頁83-97。

16 王林,《燕翼詒謀錄》,卷3云:「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載《唐宋史料筆記叢刊》,頁29;另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7載:「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邊縣州軍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

17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頁53。

的隨身備書。藉以探究出版這類書籍的書商是否有地域性之區隔，以及政府在面對民間出版科考用書時的態度。

### (一) 迎合考生背誦需求的考試用書

對於民間的出版商而言，以顧客為導向的出版策略，是最具實際，同時也是最有利可圖的出版管道。而在選擇有能力且必須購買書籍的對象中，廣大的科考學子遂成為書商極力爭取的客戶群。因此，書坊為求速利，大量出版科舉考試將會用到的各種經、史、子類書籍、<sup>18</sup> 科舉考題大全、<sup>19</sup> 時文，<sup>20</sup> 或者字書、韻書的參考用書<sup>21</sup> 等等，其目的便是在迎合市場需要，並且爭取市場佔有率，使學子甘願花費以購買坊間出版的書籍。

#### 1. 圖文並茂的考試大全

南宋書坊在出版科考用書時，為了增加書籍的實用性與功能性，利用各種「纂圖」、「互注」、「音注」、「批點」、「重言」、「重意」等方法，在書中添加圖、表、音注、名家批點，或替考生整理各種音、意、解釋，如同一本考試大全般，藉以廣泛吸引學子購買意願。像是建陽地區的書坊刊印《纂圖互註毛詩》(圖3)、《纂圖互註荀子》(圖4)、麻沙劉氏仰高堂刊《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咸淳年間由建安地區刊《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圖5)，即是最佳證明。<sup>22</sup> 而上述參考用書，出自建陽書坊的比例甚高。建陽書坊商人聰明機巧，不僅了解到科舉用書的市場形態，並且能掌握消費者的需要，充份展現該地書商高明的行銷手腕。以南宋建陽麻沙地區刊行的《纂圖互註六子全書》，其中在〈揚子序〉末有牌記一則，云：

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茲無訛謬，騰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之大也。<sup>23</sup>

18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6，〈宋刻纂圖互注經子〉：「宋刻經、子，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標題者，大都出于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頁301-302。

19 蘇軾，〈議學校貢舉狀〉提到：「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輯時務，謂之策括。」轉引自趙翼，《陔餘叢考》，卷29，〈帖括策括〉。

20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指出：「應考的士子可以在書肆買得時文。」這告訴我們「時文」一類書籍成為當時廣受士子歡迎的讀物。而書肆所賣的時文內容包括了三場考試：經義、策論，以及詩賦。該文載《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3-143。

21 像是北宋景德四年命崇文院雕印《大宋重修廣韻》五卷、《禮部韻略》五卷等書，便是官方制定頒行而成為科舉考試的韻書定本。

22 所引諸書皆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23 于敏中等編、彭元瑞續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5，〈纂圖互註六子全書〉，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牌記內容雖是書商的行銷廣告，<sup>24</sup>但「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點出建陽商人費盡心思增添「纂圖、互註、重言、重意」的做法，希望透過這些整理功夫，幫助學子順利金榜題名。這些做法，不盡是單純出於商人的營利意圖，其細心體貼之處，更是締造商機的關鍵所在。

建陽書商運用纂圖、互註、重言、重意等方法，將考生必須閱讀的書籍事先整理出來，一來可以節省考生自行整理的時間，得到考生的信賴，藉以招徠顧客；二來透過大量科考用書的銷售，還可以為自家書坊打響知名度，而利隨名至。因此，今日流傳下來「纂圖互註」類的宋版書籍，絕大多數皆出自於福建地區的坊間書坊，最初便是商人因應科考而出版的考前整理用書，卻沒意料到日後會形成科考用書的出版風潮。

## 2. 因應科考之用的節本

事實上，書坊除了整理圖文、重言重意的科考用書，以增進考生背誦時的記憶力，藉此應付各種試題之外；書商還顧慮到學子必須在短時間內閱讀卷帙龐大、數量眾多的經、史文籍，於是想方設法替學子蒐羅節本，卻無意間創造出另一種考試用書的出版市場。

以北宋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圖6）為例，該書卷數多達二百九十四卷，是一部浩瀚的史學巨著；到了南宋之際，袁樞（1131-1205）因為喜讀《資治通鑑》，但苦其浩博，遂以其為本，纂成《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以袁樞而言，編纂此書的用意，只是為了配合自己的閱讀習慣，以及方便好用，故將《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sup>25</sup>歷經數年的整理，遂於乾道九年（1173）成書於嚴州郡學。

《通鑑紀事本末》（圖7）的完成，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眾人多給予極高的評價。南宋理學家呂祖謙更公開稱讚袁樞，說道：「今袁子掇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sup>26</sup>成書三年之後，淳

24 關於牌記功能，歷來版本學者多半肯定有「行銷廣告」及「宣示版權」的功能。參見吳哲夫，〈宋代圖書出版業——市場與版權〉，頁102-109；其餘像是徐楓，〈論宋代版權意識的形成和特徵〉，頁151-156；或者祝尚書，〈論宋代的圖書盜版與版權保護〉，頁77-87，都抱持相同看法。

25 袁樞（1131-1205），字機仲，福建建安人。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序〉，載《通鑑紀事本末》卷首，宋寶祐五年（1257）湖州刊元明遞修本。

26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人稱東萊先生，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見呂祖謙，〈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載《東萊呂太史文集》，卷7；又收入《全宋文》，卷5882，第261冊，頁273。

熙三年（1176）時，參知政事龔茂良上奏請求刻袁樞書，賜予東宮，以做為皇子的史學備書。奏云：

嚴州近刊《資治通鑑紀事》一書，乃袁樞所編，其書有補治道，或取以賜東宮，增益見聞。<sup>27</sup>

當時正是孝宗在位期間，看到此奏深表同意，於是下詔「本州印十部，仍以卿本先次來上。」<sup>28</sup>換言之，孝宗不但命嚴州刊刻十部《資治通鑑紀事》，並要求龔茂良先把手邊的本子進呈，以便馬上閱讀。可見當時本書自野而朝都有正面評價。袁樞取材自司馬光《資治通鑑》，為之刪節整理成為「節本」的《通鑑紀事本末》，本在於閱讀方便，原意並不在學業上，而是個人的讀書所得。但由於該書文藻雅正，敘事經緯明晰，加以有朝廷官員的推崇及孝宗的鼓勵印行，很快地便成為書坊間爭相刊印的書籍，日後更成為學子學業必讀的考試用書。

由於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出版之後，等於將司馬光《資治通鑑》重新爬梳整理，如同節錄精華本，因此相當受到學業學子的歡迎，以至學子多半不願再耗費時間及心力，仔細閱讀長篇鉅作的《資治通鑑》。歷經二十餘年後，寧宗慶元五年（1199）四月二十七日，通議大夫黃由<sup>29</sup>上奏談到：

然臣竊觀《通鑑》正本，計二百九十四卷，所記興君誼辟與中才庸主之事，概有可法，亦有可戒。今進讀節本，類多芟摭，為進士科舉計。<sup>30</sup>

另外，在嘉定元年（1208）樓鑰〈通鑑總類序〉中，則是更清楚提及《資治通鑑》已經被出版市場列為不刊之書，根本原因就是當時士大夫或學子少有人徧讀之故，云：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大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汨於利名之場，益視為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為紀事本末，孝宗一見，以為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sup>31</sup>

27 龔茂良(?-1178)，字實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淳熙元年拜參知政事，以首參行相事。於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奏，載《宋會要輯稿》，第55冊，崇儒4之30，頁2245。

28 同前註。

29 黃由（1150-?），字子由，自號盤野居士，平江府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慶元五年時任通議大夫權禮部尚書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

30 《宋會要輯稿》，第57冊，崇儒7-22，頁2299。

31 樓鑰（1137-1213），字大防，自號攻媿主人，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所著〈通鑑總類序〉，載《攻媿集》，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雖然在樓鑰序中，並未直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出版後，完全取代司馬光《資治通鑑》在科舉考試的地位。但他提到「《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以及「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意謂當時讀書人爲求科舉背誦方便，只讀節本的做法，不單單是一種普遍現象，更影響到書坊以節本當成科考用書的刻書導向。

由於學子偷懶，不肯研讀長編鉅著的《資治通鑑》，使得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一度被士人認定其功能是專爲科考使用的類書。爲了釐正視聽，章大醇在淳祐六年（1246）〈重刻通鑑紀事本末序〉中，則說明來龍去脈：

類書之作，蓋以便觀覽、便檢閱而已，而士子遂謂場屋之計，可取具於類書，而涉獵淹貫之學日以不足。以便而媒其怠，非類書本意也。……是書（按：袁樞《紀事本末》）又隨事摭其本末而類之，蓋猶懼學者以《通鑑》爲汗漫，讀之而莫得其統也。袁公惠後學之意深矣！學者能因《本末》而詳之於《通鑑》，因《通鑑》而博極於群書，庶無負袁公類聚之旨。……是書刊於淳熙乙未（按：孝宗淳熙二年，1175），修于端平甲午（按：理宗端平元年，1234），重修于淳祐丙午（按：理宗淳祐六年，1246）云。<sup>32</sup>

序中所述，章大醇先是申明類書之作乃是便於覽觀與檢閱，與學子取其編類析分的便利功能運用在科舉考試上，則有所不同。其後又提及袁樞撰成《通鑑紀事本末》，乃盼「學者能因《本末》而詳之於《通鑑》，因《通鑑》而博極於群書，庶無負袁公類聚之旨。」

換言之，在當時士人眼中，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已被視爲《資治通鑑》的節本，書坊更將其當成科考用書而大量刻印。從孝宗到理宗朝，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刻本自從龔茂良上奏之後，流通地域便由嚴州的郡學移轉至臨安府，而且在臨安府還一再被重修刊印，顯然又再從臨安府周邊向外延伸傳播。

## （二）臨近考場的隨身備書

一般而言，對於參加科考的學子而言，如何通過考試，以達到金榜題名的結果，恐怕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一件事。因此，除了因應距離考試時間仍久，還可以細

<sup>32</sup> 章大醇，字景孟，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淳祐八年知明州。見章大醇，〈重刻通鑑紀事本末序〉，載《皕宋樓藏書志》，卷22；又收入《全宋文》，卷7784，第338冊，頁16。

細究讀的考前整理之外；書坊還為考生設想到，一旦準備動身赴考時，在赴考期間與考題內容最為切近的「時文」或「程文」整理本，或者可供隨身攜帶的巾箱本，方便考生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提綱挈領、隨時檢閱的效果，此二類書籍都是學子必備的考試用書。

### 1. 考試範本的時文、程文書

所謂「時文」或「程文」，乃是參加科學考試而寫作的文章。<sup>33</sup> 根據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三十日，翰林學士知制誥洪邁所上的奏章，大概可以略知孝宗之時，舉子寫作時文的情況：

竊見近年舉子程文，流弊日甚。……舉子左掠右取，不過採諸傳記雜說，以為場屋之備。……至其程文，則或失之支離，或墮於怪僻。……乞以此章下國子監并諸州學官，揭示士人，使之自今以往一洗前弊，專讀經書、史、子。三場之文，各遵體格，其妄論祖宗與夫支離怪僻者，嚴加黜落。庶幾士氣一新，皆務實學。文理既正，傳示四方，足以為將來矜式，上副明時長育成就之意。<sup>34</sup>

由於舉子所讀參考用書多為應付科考之需，因此在寫作程文時，便不免東抄一句，西抄一句，造成文章支離破碎的情況。有鑑於此，洪邁提出要士人專讀經、史、子書，以去除程文內容支離怪僻的弊病。

然而，以洪邁的奏章建議，即使真被朝廷採納而公告周知，但能否真的杜絕舉子專讀科考用書或時文的習慣？而民間書坊是否也會因而停止鑲刻這類科考書籍？答案不證自明。因為三年之後，在紹熙元年（1190）三月八日，光宗下了一道詔令，禁止建寧地區的書坊鑲雕策試文字，違者毀板。

建寧府將書坊日前違禁雕賣策試文字日下盡行毀板，仍立賞格，許人陳告。有敢似前冒犯，斷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餘州郡無得妄用公帑刊行私書，疑誤後學，犯者必罰無赦。<sup>35</sup>

33 根據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在註 14 提到關於時文的概念，說道：「時文一詞究竟起於何時，目前尚難考訂。……換句話說，時文的對立面是古文，而前者是為了準備考試所寫的文章。」，頁 191。

34 洪邁（1123-1202），饒州鄱陽（今江西鄱陽）人。見氏上奏，〈乞糾舉子程文流弊疏〉，載《宋會要輯稿》，第 109 冊，選舉 5 之 10，頁 4317-4318。

35 宋光宗，〈禁雕賣策試文字詔〉，載《宋會要輯稿》，第 166 冊，刑法 2 之 124，頁 6557。

其後，又於四年（1193）六月十九日，又再度對四川地區下了一道嚴禁雕印奏章、封事、程文的詔令：

四川制司行下所屬州軍，並仰臨安府、婺州、建寧府照見年條法指揮，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板及已印者，並日下追取，當官焚毀，具已焚毀名件申樞密院。今後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仍委各州通判專切覺察。如或違戾，取旨責罰。<sup>36</sup>

從光宗這幾年間所下詔令看來，顯然書坊雕鏤策試文字，即時文，或稱程文這類書籍的情況，應是有增無減，並且有越來越不受到控制的現象。當時最早出版印行這類時文書的書坊，極可能是建陽地區的出版商，而在被下達禁令之後，轉而至四川地區繼續刊行。而透過政府所下的詔令，我們可以看出南宋時期因應科考而出現的時文書，先在福建被大量鏤刻，而後才陸續轉移到四川，在時間點上便有了先後之分，自然影響到書籍流動的時空範疇。

事實上，民間大量出版時文書供舉子閱讀，也不斷遭到政府的禁止，這種現象早在北宋年間便是如此。<sup>37</sup> 政府下達各種禁令，卻始終無法圍堵時文書籍或其他科考用書的出版，這也讓民間出版商有了永續經營的商機。確實，此種現象到了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正月，以及開禧元年（1205）三月，分別有奏章進呈，內容皆是請求朝廷精選時文或程文梓印出版，以供舉子研讀學習之用。慶元五年，禮部尚書黃由的奏章〈乞選刊程文奏〉：

竊見向來臣僚奏請，凡書坊雕印時文，必須經監學官看詳。比年所刊，醇疵相半，未足盡為楷則。策復拘於近制，不許刊行。乞將今來省試前二十名三場程文，並送國子監校定。如詞采議論委皆純正，可為矜式，即付板行。<sup>38</sup>

開禧元年三月六日，蕭達上奏〈乞選擇時文刊行奏〉：

36 宋光宗，〈嚴禁雕印奏章封事程文詔〉，載《宋會要輯稿》，第166冊，刑法2之125，頁6558；又收入《全宋文》，卷6416，第283冊，頁72。

37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引用《宋會要》選舉4:3分別是崇寧二年（1103）及《宋會要·刑法二》2:67政和七年（1117）政府所頒禁令：「時文印版一切焚毀。今後除府、監發解、省試并大學補試、公私試第一名經義，方許印行，其餘悉不得賈售。」因此，劉文說道：「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說明朝廷的管制事實上是說的比做的容易。」，頁165。

38 《宋會要輯稿》，第109冊，選舉5之21，頁4323；又收入《全宋文》，卷6461，第284冊，頁399。

竊觀比年場屋之文，氣體卑薄，詞藻浮虛。以經學言之，則未嘗精思熟究，安能探索微妙；以史學言之，則未嘗博覽彊記，安能貫通顛末；此外如諸子前賢文集，則罕曾誦習，皆用時文套類。是以學多寡陋，文多凡下，其間學粹而文典者，百不一二。曩歲知貢舉者荐請于朝，令監學官選擇時文百篇，以為模楷，有旨從之。然竟寢不行。……乞檢會指揮，委監學官公共選擇紹興以來累舉所取六經義、詩賦、論策，擷其文詞典雅，學問該贍，而膾炙眾口，可傳誦習者數十篇，特令刊行，使士子有所矜式。<sup>39</sup>

黃由提到幾年之間，「凡書坊雕印時文，必須經監學官看詳」，方可梓印，此顯然是受到先前禁令的影響。這段期間，書坊編印出版時文必然受到限制，而時文擇取質量不佳，也會造成書籍的流通不廣，致使學子無由學習。因此，官員才會奏請朝廷精選時文刊印，使得書坊再度擁有出版時文書的商機。

## 2. 方便攜帶的巾箱小本

南宋書坊商人迎合科舉行業以販售書籍的情形，還不止於此。利用小巧易攜的巾箱本，則是書商出版科考用書的另一種手法。

巾箱本最早出現於南朝，但當時只是貴族、文人間的閒逸雅趣，做為案頭閱讀或收藏之用。<sup>40</sup> 然而，南宋時代的書坊商人卻從這種袖珍小字本的裝幀形式發現商機。巾箱本小巧輕便，正符合學子赴考不便攜帶過重書籍的最佳選擇。書商取巾箱本的裝幀小巧，紙墨成本所費不多；而其隨買隨棄的特性，又可帶來薄利多銷的效果。(圖 8、9)

但初時書坊刊行的巾箱本，是指書籍尺寸小於一般正常開本，所以又被稱為「小本」，或「小冊」，亦有稱為「小書板」。此與後來被稱為考場弊端之一的「懷挾」與「夾袋」本，並不相同。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不但著書講學，<sup>41</sup> 同時也從事刻書活動。他曾經在與呂祖謙的書信中，頻頻提到「小本」、「小冊」。像是：

39 蕭遠，臨江軍新喻人，載《宋會要輯稿》，第 109 冊，選舉 5 之 31，頁 4328；又收入《全宋文》，卷 6441，第 284 冊，頁 44。

40 《南史》，卷 41，「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41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於福建尤溪。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調泉州同安縣主簿。淳熙五年知南康軍，在任期間，重建白鹿洞書院。

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雖不為不精，尚亦有闕誤。……《橫渠集》已畢未耶？得本早已見寄，幸甚！如此間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蓋版在官中，終是不能廣也。<sup>42</sup>

之後在寫給呂祖謙的信中，又提到「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sup>43</sup>這裏的「小本」，乃是相對於「大本」而言，是指開本較小的書籍。而刊刻小本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欲廣流傳。另外，亦有稱「小冊」，同樣是指小開本的書籍。

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sup>44</sup>

而張栻與朱熹的往來書信中，亦有稱其刻書為「小書板」，<sup>45</sup>顯然朱熹當時在建陽刻書時，便已著手刊刻開本較小的巾箱本。另外，李岐（一作耆）岡<sup>46</sup>於嘉定五年（1212）撰〈省心雜言跋〉中，也提到他在書肆中看到書坊刊小本《雜言》販售，竟誤題為北宋著名詩人林和靖所作。

先大父敷文（按：李邦獻）平居自號省心，《雜言》一編，皆箴規訓戒之辭。岐岡兒童時尚及見其手稿。板行於蜀，名公鉅卿書其前後者非一。士大夫愛重之，以其本刊于池陽，于新安，皆以為大父之文也。嘉定戊辰（按：元年，1208），岐岡調官都城，見書坊有刊小本鬻於市，以為林和靖之作。……不知妄人俗子何所據而云然，甚可怪也。岐岡通守邵陽，敬以舊本摹寫，鋟木以廣其傳，可以破流俗之惑。<sup>47</sup>

事實上，從孝宗到寧宗嘉定年間，書坊將書籍編印成小本販售於書市，乃取其小巧精簡、方便攜帶，可以廣為流傳。咸淳六年（1270），李杲〈重刻可齋雜稿跋〉提到欲為其父李曾伯出版《可齋雜稿》的源由時，說道：「嘗欲手抄小帙，未果。

42 朱熹，〈答呂伯恭〉，載《晦庵集》，卷33，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 朱熹，〈答呂伯恭〉，載《晦庵集》，卷35。

44 朱熹，〈答呂伯恭〉，載《晦庵集》，卷33。

45 張栻（1133-1180），〈答朱元晦秘書〉：「比聞刊小書版以自助，得來論乃敢信。」見氏著，《南軒先生文集》，卷21，宋淳熙慶元間嚴州刊本；又收入《全宋文》，卷5724，第255冊，頁85。

46 據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省心雜言》卷末跋記載為「耆岡」二字。

47 李岐（耆）岡，祖籍懷州（今河南沁陽），邦獻孫。嘉定間通判邵州，權州事。見李邦獻著，《省心雜言》卷末，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收入《全宋文》，卷6975，第305冊，頁451。

會書市求爲巾箱本，以便致遠。」<sup>48</sup>可見，當時書坊已有巾箱本形式，其最初目的乃爲了流傳廣遠。

由於巾箱本開本小，印製成本低，於是被機巧的商人運用在科考用書上，甚至後來更被製成「懷挾」與「夾袋」本，被考生携入考場。嘉定十六年（1223）七月十日，國子博士楊璘上奏：

今書坊自經、子、史、集、事類、州縣所試程文，專刊小板，名曰夾袋冊。士子高價競售，專爲懷挾之具，則書不必讀矣。……乞申嚴挾之禁，仍下諸路運司，令州縣拘收書坊夾袋夾小板，並行焚毀。嚴立罪賞，不許貨賣，自臨安書坊爲始，後批送禮部看詳。<sup>49</sup>

同年上奏者，還有太學博士胡剛中。<sup>50</sup>可見嘉定年間，書坊刊刻小本或夾袋冊的情形，已是相當嚴重。

事實上，懷挾風氣自北宋以來即有，然始終無法禁絕。<sup>51</sup>到了南宋中葉，這種現象有增無減，而各地書坊爭相印製巾箱本，尤以臨安及福建書坊所刻數量最多。<sup>52</sup>巾箱本的出版，若撇開誤用於涉及考場弊病的問題外，從正面來說，可以視爲書坊商人積極營利的商業精神，以及高明的行銷手法；而取巾箱本方便攜帶的特性，以帶動跨地域的書籍傳播，更可以說是南宋書籍流通過程中多元化的最大功臣。

### 三、醫書的出版與流通

兩宋時期醫書的出版，自北宋仁宗開始，在國家力量的主導及推動下，有了顯著的進展。<sup>53</sup>政府爲了醫書的搜訪、校正、編纂，以至出版，不但在嘉祐二年

48 李杲，祖籍懷州（今河南安陽），後徙嘉興，曾伯子。嘗刻其父文集行於世。〈重刻可齋雜稿〉，載李曾伯著，《可齋雜稿》，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收入《全宋文》，卷 8250，第 356 冊，頁 239。

49 楊璘，字德翁，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登開禧元年進士第。見氏奏〈請禁止夾袋冊疏〉，載《宋會要輯稿》，第 109 冊，選舉 6 之 49，頁 4354。

50 胡剛中，字正夫，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元年登進士第，嘉定末爲太學博士。上〈乞嚴禁夾袋奏〉云：「近來場屋違戾，書坊規利，撰印小冊，名曰夾袋，以使其用。若不痛革，此弊日滋。欲從禮部行下諸路運司遍州縣，應書坊夾袋、小板、懷挾日下焚毀，不許貨賣。嚴立罪賞，務在必行。」載《宋會要輯稿》，第 109 冊，選舉 6 之 50，頁 4354。

51 劉子健，〈宋代考場弊端——兼論士風問題〉，收入《兩宋史研究彙編》，頁 229-247。

52 岳珂（岳飛之孫），《愧郗錄》云：「場屋編類之書，建陽書坊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四方傳習。」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 李經緯，〈北宋皇帝與醫學〉，頁 3-20。

(1057) 設置「校正醫書局」，並且命國子監摹印，以使「天下皆知學古方書」。<sup>54</sup> 雖然經由官方力量使得醫書出版漸趨普及，也打破了宋代以前醫學知識以父子相承、師徒授受的「封閉傳承管道」，<sup>55</sup> 但負責醫書的編刊梓印，以及醫書的主要閱讀對象，仍是士人階層。<sup>56</sup>

到了南宋初年，由於國家物資匱乏，國子監刻書工作直至紹興末年才正式展開，<sup>57</sup> 因此不但無法延續北宋時期大規模刊行醫書的盛況，還出現宮中醫人私自抄錄藥方醫書，甚至流傳在外的情形。紹興二十年（1150）七月二十七日，高宗下了一道詔書，嚴厲申明：

御藥院供進湯藥方書，不許傳錄出外。如違，徒二年；幹辦官不覺察，同罪。許人告捉，賞錢五百貫。<sup>58</sup>

以紹興年間，臨安府刊刻一冊官方書籍的售價僅五貫文錢上下，<sup>59</sup> 而告發傳錄醫書人的賞錢竟高達五百貫，足有百倍之差；加以罰則綦重，由此顯見當時私抄外傳宮廷醫書的情形必然十分嚴重，以及民間對醫書的需求甚高，才使得宮廷醫人為取得醫書而干願犯險。然此道禁令成效如何，目前雖未見相關記載。但自孝宗朝之後，民間士人編纂刊印醫書日益增多，遠遠超過高宗紹興年間，其中又以「隨症附方」的「方書類」醫書，因其實用性最高，數量亦最多。可見高宗所頒禁令仍然發揮了成效，也使得南宋初期的官方醫書出版及傳播受到約束。

即便如此，從高宗到孝宗朝期間，民間醫書的編印出版日益增多，此應為得力於士人的積極投入。士人之所以獻身醫書的編印出版，主要原因有三：

54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三，〈外臺秘要〉條下：「大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所校定也。按《會要》，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每一書畢，即奏上，（林）億等皆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并補注《本草》，修《圖經》、《千金翼方》、《金匱要略》、《傷寒論》，悉從摹印，天下皆知學古方書。」見氏著，載《書目續編》，頁 821。

55 陳元朋，〈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為之傳衍〉，收錄在《宋史研究集》，第 31 輯，頁 431-533。

56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頁 73-75。

57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 4，云：「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頁 114-115。

58 《宋會要輯稿》，第 71 冊，職官 19 之 15，頁 2818。

59 根據葉德輝，《書林清話》，卷 6〈宋監本書許人自印并定價出售〉記載明影宋紹興十七年刻《王黃州小畜集》前記一則，云：「竊見《王黃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所在未曾開板，今得舊本計壹拾陸萬參仟捌佰肆拾捌字，檢准紹興令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除依上條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捌冊，計肆佰參拾貳版。合用紙墨工價下：印書紙并副板肆佰拾捌張，表背碧青紙壹拾壹張，大紙捌張，共錢貳佰陸拾文足。賃板、棕墨錢伍佰文足，裝印工食錢肆佰參拾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壹貫壹佰參拾陸文足。見成出賣，每部價錢伍貫文省。右具如前。紹興十七年七月」，頁 148。

第一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由於宋朝文人普遍有「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sup>60</sup>的觀念，認為為官與為醫者皆具操個人吉凶生死之權柄，故「良醫與良相同尊」，<sup>61</sup>甚至曾丰還以范仲淹為例，說明此種觀念：「余惟范文正公得志為相，不得志為醫，為皆可以活人故爾。」<sup>62</sup>換言之，士人若無法為相、為官，則可以為醫。

第二則是基於現實考量，士子在不得志於舉業時，便會轉求醫道。宋嘉泰二年（1202）曾丰〈章牧之學脈指要序〉在提到章牧之撰書源由時，說道：

崇仁章謙，字牧之，服儒業，舉子成矣，累試於有司不得志，轉為醫數十年，始著《學脈指要》。<sup>63</sup>

另外，淳祐元年（1241）施發在自敘編印《察病指南》（圖 10）時，亦說道：

余自弱冠有志於此，常即此與舉業並攻。迨夫年將知命，謝絕場屋，盡摒科目之累，專心醫道。<sup>64</sup>

第三，自從北宋徽宗之後，儒醫可以入朝為官，在朝中地位並不輸給科舉入仕的學子，因此吸引許多有志之士加入習醫行列；再加上，南宋初期學子可以攜帶醫經進入考場，參加醫學考試。醫書需求量增加，無形中促進士人投入編印醫書的行列。<sup>65</sup>

在士人的積極參與下，民間醫書的編印風氣日漸盛行。高宗紹興年間，南宋士人自行編印醫書的數量尚且不多。其後，迨孝宗即位，以迄光宗、寧宗，計六十二年期間，是南宋醫書出版最興盛的時期，各種類型的醫書相繼出現。其中，方書類醫書數量尤多，其次為傷寒類的醫書。

由於方書內容係隨症附方，症狀及藥方的範圍十分廣泛，故實用性最高，亦最受醫者及尚醫士人的歡迎。其中，在常見的方書之中，以高宗紹興年間的許叔微

60 此種觀念在南宋士人撰寫醫書序跋中最为明顯，像是淳熙十一年（1184）徐安國，〈衛生家寶方序〉：「傳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醫卜賤伎，而有道之士所注意焉，何也？吉凶死生，民之大患也。」載朱瑞章，《衛生家寶方》；收入《全宋文》，第225冊，卷4989，頁54-55；或者宋寶祐元年（1253）嚴用和〈濟生方序〉：「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載嚴用和，《嚴氏濟生方》十卷，卷首，宋刊影鈔配本，皆提及此一觀念。

61 錢聞禮，〈類證普濟本事方序〉，載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卷首，清雲間王陳梁刊本；又收入《全宋文》，卷4974，第224冊，頁222-223。

62 曾丰（1142-?），字幼度，號搏齋，吉州永豐人。見氏著，〈贈劉晉卿醫者序〉，收入《全宋文》，卷6281，第277冊，頁305-306。

63 曾丰，〈章牧之學脈指要序〉，收入《全宋文》，卷6282，第277冊，頁324。

64 施發，字政卿，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見氏著，《察病指南》，卷首，〈察病指南序〉，日本室町中期刊本；又收入《全宋文》，卷7925，第343冊，頁202-203。

65 鄭學寶、鄭洪，〈略論宋代醫學考試的特點〉，頁74-77。



《類證普濟本事方》及孝宗淳熙年間的楊倓《楊氏家藏方》最富盛名，流傳亦最廣。

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圖 11、12），又稱《本事方》，最早刊行於紹興二年（1132），是許氏晚年之作，彙集生平經驗有效之方、醫案，以及理論心得。之所以取名為「本事」，乃是表明所記皆為親身體驗之事實。自許氏成書後，初次刊行地點可能是在江浙之間；過了三十年，乾道六年（1170）先有歷陽張郊刻於江夏郡齋，<sup>66</sup>到了乾道九年（1173）時，又有曾協在湖南零陵再度刊行；其後陸續從尚醫士人錢聞禮、淳熙十二年（1185）張孝忠、嘉定元年（1208）劉幸的序跋中，看出該書自紹興二年初刻之後，歷八十年期間，仍不斷有尚醫士人重新刊印，足證其受歡迎的程度。此外，本書的流傳情形，還可以進一步從刻書地域及傳布範圍得到了了解。根據曾協〈題本事方後〉跋文：

某伯父諫議公紹興丙辰歲守新安，叔舅強常州在焉。而幕中有許叔微知可，老於文學，而深尤於方書。……後三十年，乃得此書於士大夫家，皆推已然之明效以告後之人。……某乾道癸巳假守零陵，因鈔刻置於郡中，以廣許公濟眾之志。<sup>67</sup>

其後，錢聞禮〈類證普濟本事方序〉亦云：

許子叔微，白沙人也。……手著《傷寒發微論》、《傷寒百證歌》、《議證》二十二篇、《仲景脈法》諸書，皆膾炙人口。至《本事方》，其後焉者也。舉生平救治諸方，投而輒驗者，集成一書，分為十卷，名曰《證治普濟本事方》。……身處乎僻壤窮鄉，求良醫不足者，得是書而珍惜之，開卷亦可檢方，斟酌即能自藥。<sup>68</sup>

以及，張孝忠〈普濟本事方跋〉，則清楚指出有湖北刻本的出現：

家叔與之遊，此方所從發也。後刊板武昌，苦無善本，以正訛謬。……歲旦一紀，孝忠來官夷陵（按：今湖北）……鈔木家塾，于以成叔父之志。<sup>69</sup>

到了嘉定元年，劉幸〈本事方序〉不但指出本書到了寧宗時仍持續在出版，更說明

66 張郊於乾道庚寅十二月撰跋：「郊嘗假守儀真，知其事為詳。因以此書刻板置江夏郡齋，非但廣知可救物之心，且著天道福善之報云。」載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清雲間王陳梁刊本。

67 曾協（1119-1173），字同季，建昌軍南豐（今江西南豐）人。見氏著，《雲莊集》，卷四，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收入《全宋文》，卷 4852，第 219 冊，頁 50。

68 錢聞禮，嘉興（今浙江嘉興）人，著有《錢氏傷寒百問方》、《傷寒百證歌》。序收入《全宋文》，卷 4974，第 224 冊，頁 222-223。

69 張孝忠，字正臣，歷陽烏江（今安徽和縣）人。跋收入《全宋文》，卷 5720，第 377 冊，頁 254。

傳佈的地域及範圍。

醫生呂啟宗與余言曰：啟宗晚學醫，於醫家書未多讀，獨求其論證明白，用藥精審，無如許知可學士《本事方》。許，儀真人。今是方之流行江浙間多，真所刊本火於兵，今不復存。啟宗大懼此書之泯，無以惠方來，嘗試以語句曲施君某，施欣然欲鏤板以廣其傳，願未得善本。公嘗官於真，盍從公求之。余即授以真舊本。<sup>70</sup>

從最初的儀真（位於今江蘇中西部）初刻本，到江夏郡齋的二刻本、湖南零陵的三刻本、湖北武昌的四刻本、湖北夷陵的五刻本，以迄劉宰序中所提到取儀真舊本再度鏤版重刻之六刻本。換言之，本書在南宋中葉以前至少歷經六度鏤板，流傳地域遍布於長江、淮水流經的江浙淮地區。可見書籍的流通不但有其時間性，而從地域性的流動範圍更可以看出知識傳播的時空軌跡。

除了許叔微《本事方》外，楊倓《楊氏家藏方》（圖 13）成書時間雖然較晚，然亦是民間暢銷的方書之一。不過，在時間性及地域性上，雖與《本事方》傳布地域集中於江浙淮間頗為重疊，但仍有值得進一步討論之處。《楊氏家藏方》第一次刊行於淳熙五年（1178），根據楊倓在卷首自序說道：

余家藏方甚多，皆先和武恭王（按：楊存中）及余經用與耳目所聞嘗驗也。揭來當塗，郡事多暇日，發篋出之，以類編次。凡用藥相似，而責效不同者皆備列之，得一千一百一十有一道。蓋今之為醫者，皆有嘗試之方，深藏篋中，不輕以語人，僥倖一旦之售，以神其術。今余之所得，多良醫之深藏而不語人者也，方將使人家有是書，集天下良醫之所長，以待倉卒之用，不亦慈父孝子之心乎？于是鏤木郡齋，以廣其傳云。<sup>71</sup>

由於楊倓於淳熙元年擔任簽書樞密院事，其後又歷任荆南、隆興、江陵諸府。從序中得知，淳熙五年時，楊氏正好在當塗郡（今安徽）任職，因此《楊氏家藏方》的初刊地在當塗郡。隔了七年，淳熙十二年（1185）延璽重刻本書，並在〈楊氏家藏方跋〉文中說明這幾年之間流傳的情形：

樞密洪、楊二公，給事胡公，前後守當塗，各有方書，鏤木於郡中，亦遺愛之一端也。其名曰《洪氏集驗》、《楊氏家藏》、《胡氏經驗》，今江淮間

70 劉宰（1166-1239），字平國，號漫堂，鎮江府金壇（今江蘇金壇）人。見氏著《漫塘集》，卷 19，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收入《全宋文》，卷 6838，第 300 冊，頁 18。

71 楊倓（?-1181），代州崞縣（今山西原平北）人。見氏著，〈楊氏家藏方序〉，載《楊氏家藏方》卷首，收入《全宋文》，卷 4870，第 219 冊，頁 342。

士大夫與醫家多用此三書，對證以治疾，無不取效。閩中相去差遠，猶未之有，今刊諸憲司，將以惠眾，抑亦副三公欲廣其傳之意云。<sup>72</sup>

跋中提到「今江淮間士大夫與醫家多用此三書，對證以治疾，無不取效。」可見《楊氏家藏方》與另外二部方書，自從出書以後，則多半傳布於江淮之間。而曾經擔任過嚴州觀察使的延璽，認為此三書皆佳，可惜僅傳布於江淮間，閩中地區猶未見到，於是運用官方力量，命令俗稱「憲司」的福建提刑司機構刻印此三部醫書，以嘉惠大眾，並廣流傳。此點與仰賴民間自發性出版的情形不同，在加入官方力量的介入後，不但使得醫藥方書的出版自江淮間移至閩中地區，同時也意味著流布範圍也更為擴大延伸。

上述方書，主要是適用於一般成年人。另有適用於婦幼的醫藥方書，其中流傳最廣的幼童醫書，當屬紹興二十年（1150）時，湖南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劉昉與幹辦公事王曆、鄉貢進士王湜共同編纂，而由四明樓璿續編出版的《幼幼新書》四十卷，這是一部著名的幼兒疾病雜症方書。

《幼幼新書》（圖 14）的成書，乃因劉昉公務之暇，有感於小兒疾苦，但世無良醫，且無這類書籍可供參考，嬰孩幼童因此喪命者，不可勝計。故取材古代聖賢方論與近世聞人家傳，尋訪民間祕方，兼收並錄，遂命王曆、王湜編輯成書。<sup>73</sup> 由於是書保存許多南宋以前的兒科醫學文獻，並有臨床實驗證明的具體成效，因此編成之後，廣受儒醫歡迎。此從卷首有劉昉門生李庚撰序，及卷末河南石才儒後序敘述，便知其初刻本在四明郡（今浙江鄞縣），而傳布地域亦在江淮一帶。此書在南宋年間流傳甚廣，傳至明朝以後，再經由萬曆年間尚醫士人陳履瑞刪節重編，而變成今日通行的版本。<sup>74</sup>

此外，編印方書的目的，大多是為了以廣流傳。但也有例外，像是專治婦科及產科的醫療方書，編者因藥方取得不易，便不希望讓太多人知道。以孝宗隆興二年（1164），鄭春敷編輯《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為例，根據鄭氏自序提及編書緣由，

72 延璽，隆興間知象山縣，淳熙初知儀真縣。淳熙八年以武節大夫安撫淮西，兼知廬州。見氏著，《楊氏家藏方跋》，收入《全宋文》，卷 4895，第 221 冊，頁 92。

73 李庚，《幼幼新書序》云：「湖南帥潮陽劉公鎮拊之暇，尤善方書。每患小兒疾苦，不惟世無良醫，且無全書，孩抱中物不幸而殞於庸人之手者，其可勝計！因取古聖賢方論與夫近世聞人家傳，下至醫工技工之禁方，閭巷小夫已試之祕訣，無不曲意尋訪，兼收並錄。命幹辦公事王曆義道主其事，鄉貢進士王湜是編其書。」載劉昉、王曆、王湜編，樓璿續編《幼幼新書》，卷首，明萬曆十四年古吳陳氏刊本。

74 劉昉、王湜編，樓璿續編《幼幼新書》，明萬曆十四年古吳陳氏刊本。

序文最後並再三囑咐後人，不可輕易借覽及流傳外人，其云：

吾早歲學醫，求醫書若干卷，如《產寶》、《產經》、《良方》、《濟生》等書，靡不較閱。……是以集諸家之善，抄世驗之奇，始於調經，繼以脫產，終於雜症。……囑我後人，不可輕視苟傳，雖至親密友，如甥舅師弟之間，不可借覽。余已祝天設誓，後之子孫不可輕犯。家無恆產，此是金穴。<sup>75</sup>

鄭春敷此語可謂影響深遠。到了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太醫院監局兼翰林院提舉鄭仲饒無意間得到此書，並加以重刻，序末亦不忘叮囑後人：

凡為吾後之子孫，若拱璧視之，勿弁髦忽之，而輕借與人，輕售與人。<sup>76</sup>

事實上，南宋初期，這類女科醫書即使編印出版，多半仍被祕藏於少數人家中。但自從寧宗下令將醫學設科之後，婦科被列入官方醫學教育的其中一環，此後女科醫書便同於其他類型的醫書編印出版，以廣其傳。寧宗朝太醫局教授齊仲甫即因隸屬婦科，緣於工作職責，而編輯《女科百問》。據其自序云：

恭惟聖朝列聖繼承，念民疾疹，創學設科，釐為十三科，各有專習。……於是婦室始專科矣，可無成書乎？仲甫分職其科醫學，不敢怠事，輒忘蒙昧，嘗集眾方，纂成一帙，目曰《女科百問》。又自孕元胎始，氣形將護，產前後諸雜病症，附為《產寶雜錄》。……故著為此書，既欲行於世，豈可不聞於朝？

自此之後，女科方書不再被祕藏家中，士人、醫者皆可購置，於是流傳漸廣。

到了理宗朝，任職於建康府明道書院醫諭的陳自明，<sup>77</sup>因三世學醫，家藏醫書若干，遂於嘉熙元年（1237）編成《婦人大全良方》（圖 15）。由於內容分成二十四卷，計十門，二百餘論，其引述多種醫書，且詳實有據，成為南宋時第一部最完備的婦產科專著。到了景定四年（1263），又撰成《外科精要》、度宗咸淳七年（1271）《備急管見大全良方》，都是陳自明徧行東南各地，盡索方書以觀，且訪求藥方反覆參驗所得。雖然從陳氏自序中未能看出這幾部醫書的出版地域，但以當時他身為建康府明道書院醫諭的身份，不難推測極可能在福建地區初次印行。

75 鄭春敷，隆興間醫人。見氏著，〈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自序〉，收入《全宋文》，卷 4971，第 224 冊，頁 179。

76 鄭仲饒，咸淳前後任太醫院監局兼翰林院提舉。見氏著，〈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序〉，收入《全宋文》，卷 8210，第 354 冊，頁 463。

77 陳自明，字良甫，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三世學醫，嘉熙中任建康府明道書院醫諭。

理宗朝除了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之外，尚有一些著名醫書的編印，像是理宗寶慶二年（1226）聞人耆年《備急灸法》、紹定五年（1232）聞人規《小兒痘疹論》、淳祐元年（1241）施發《察病指南》、淳祐三年（1243）《續易簡方論》、寶祐元年（1253）嚴用和《嚴氏濟生方》，其後到了度宗咸淳三年（1267）又有《嚴氏濟生續方》的出現。此時醫藥方書的編纂，多是參考前人編撰內容之未備，兼取暇日所搜之病症藥方而成。後出醫書雖較之前書，所蒐方症更爲豐富，用藥也更爲周全，然大抵沒有太多新意與變化，使得醫書的編纂陷入瓶頸，出版量亦隨之減少。

之後，到了度宗咸淳年間，除了將原有醫書不斷地重刻之外，新編纂的醫書僅有二年（1266）朱佐《類編朱氏集驗醫方》、三年（1267）王元福《新大成醫方》，以及五年（1269）李駟《黃帝八十一難經註義圖》，出版質量明顯較前期銳減。換句話說，從南宋理宗、度宗，以迄末期的恭帝、端宗、衛王，這段時期醫藥方書的編印與出版明顯不如中期繁榮，而有漸趨衰微的現象。

醫藥方書的出版市場與流通地域，從初期多半集中在以長江、淮水流經的江浙淮地區，到後來朝向福建出版的發展走勢看來，醫藥書籍在流通過程中，確實受到時間與空間環境的限制，而有時間先後之別與地域之分。

#### 四、結 論

南宋隨著政權的逐漸穩定，政府開始重視經、史類書籍及科考用書的出版。從官方的國子監刻本，到地方公使庫、轉運司、漕司、郡州縣學等機構，皆鼓勵自行刻書出版，自營自銷，並作爲補貼財政之用。這種策略從正面而言，具有帶動並刺激南宋年間民間刻書事業的發展，但也造成官民之間在考試用書的出版方向產生歧見與矛盾。

文中指出，書商、書坊爲迎合舉子所刻印的書籍，採用「纂圖」、「互注」、「音注」、「批點」、「重言」、「重意」等手段，利用書中添加的圖、表、音注、名家批點，或整理各種解釋等方式，藉以廣泛吸引學子購買的意願，上述參考用書，出自建陽書坊的比例甚高。反映建陽書坊商人聰明機巧，不僅了解到科舉用書的市場形態，並且能掌握消費者的需要，充份展現該地書商高明的行銷手腕；而因應考試所出現的精簡本、節本之類的出版品，一方面爲了迎合臨安地區大量考生的需要，刻書地域從嚴州郡學移轉至臨安府，並進一步擴及臨安府周邊，甚至向外延伸發展。

至於為赴考生整理的「時文」或「程文」整理本，也因科舉需要而使市場愈益擴展，即使政府下詔禁止卻效果不彰。從目前相關文獻資料顯示出，最早大量刊印這類時文書的書坊，極可能是建陽地區的書商們，而在出版質量皆過於浮濫的情況下，被政府下達禁令，部分書商遂轉移陣地至四川繼續印行。因此，透過政府的詔令，我們可以看出南宋時期因應科考的時文書，曾經先在福建地區被大量出版，之後幾年則是轉移到四川地區，其在時間點上便有先後之別，自然也會影響到書籍流動的時空範疇。

另一種書商為方便學子赴考所製作以供隨身攜帶的巾箱本，從孝宗到寧宗嘉定年間，書坊將書籍編印成小本販售於書市，乃取其小巧精簡、方便攜帶，可以廣為流傳。由於巾箱本開本小，印製成本低，於是被機巧的商人運用在科考用書上，甚至後來更被製成「懷挾」與「夾袋」本，被考生携入考場。嘉定年間，書坊刊刻小本或夾袋冊的情形，已是相當嚴重。但另一方面正反映出書坊商人積極營利的商業精神，以及高明的行銷手法，而取巾箱本方便攜帶的特性，以帶動跨地域的書籍傳播，更可以說是南宋書籍流通過程中多元化的最大功臣。

本文也試圖從醫書出版情況了解南宋書籍流通的意義與特色。南宋初年，由於國家物資匱乏，國子監刻書工作直至紹興末年才正式展開，因此不但無法延續北宋時期大規模刊行醫書的盛況，還出現宮中醫人私自抄錄藥方醫書，甚至流傳在外的情形。從高宗到孝宗朝期間，民間醫書的編印出版日益增多，此應為得力於士人的積極投入。在士人的積極參與下，民間醫書的編印風氣日漸盛行。高宗紹興年間，南宋士人自行編印醫書的數量尚且不多。其後，迨孝宗即位，以迄光宗、寧宗，計六十二年期間，是南宋醫書出版最興盛的時期。

文中以高宗紹興年間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與孝宗淳熙年間的楊倓《楊氏家藏方》為例指出，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從最初的儀真（位於今江蘇中西部）初刻本，到江夏郡齋（位於今湖北）的二刻本、湖南零陵的三刻本、湖北武昌的四刻本、湖北夷陵的五刻本，以迄劉宰序中所提到取儀真舊本再度鑿版重刻之六刻本。換言之，本書在南宋中期以前至少歷經六度鑿板，流傳地域遍布於長江、淮水流經的江浙淮地區。可見書籍的流通不但有其時間性，而從地域性的流動範圍更可以看出知識傳播的時空軌跡；而《楊氏家藏方》與另外二部方書，自從出書以後，則多半傳布於江淮之間。而曾經擔任過嚴州觀察使的延璽，認為此三書皆佳，可惜僅傳布於江淮間，閩中地區猶未見到，於是運用官方力量，命令俗稱「憲司」

的福建提刑司機構刻印此三部醫書，以嘉惠大眾，並廣流傳。此點與仰賴民間自發性出版的情形不同，在加入官方力量的介入後，不但使得醫藥方書的出版自江淮間移至閩中地區，同時也意味著流布範圍也更為擴大延伸。

由於南宋時代的書籍流通研究正處於方興未艾之際，許多議題尚有待今後更進一步的發掘與探索，本文目前僅先從科舉用書以及醫藥方書兩個層面，試圖對南宋書籍的出版地域與流通空間之間的關係進行初步討論。事實上，除了科舉用書以及醫藥方書之外，還有像是唐、宋文人的文集出版、日用類書或者天文、占卜、宗教等其他書籍性質，在宋代的書籍出版市場仍有許多待深入探討的課題，尤以結合傳播學的角度，重新思考與詮釋書籍流通的傳播意義與價值。然此一課題涉及範圍較廣，尚留待日後另文深入討論，期以本文為拋磚之作，得以引起更多研究者注意到此一課題。

〔後記〕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0年11月22至24日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首先感謝評論人南京大學文學院鞏本棟教授對於本文的肯定、鼓勵與建議；以及臺灣大學王德毅教授於會中提出的幾點意見，都對本文在修改期間提供很好的提醒及幫助；再者，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李華瑞教授及美國考爾比大學（Colby College）魏文妮（Ankeny Weitz）博士亦對文章多有鼓勵。此外，論文撰寫期間，承蒙本院圖書文獻處周維強助理研究員、林加豐先生提供南宋文化史等相關資料及書籍參考；最後，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附表 南宋時期醫書出版的時間及地域表（按：編撰者以南宋時期人為主）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或重刊時間	出版或重刊地點
1	類證普濟本事方	許叔微	紹興二年（1132）	儀真（江蘇西南部）
			乾道六年（1170）	江夏郡齋（湖北）
			乾道九年（1173）	零陵（湖南）
			淳熙十二年（1185）	武昌、夷陵（湖北）
			嘉定元年（1208）	不詳
2	幼幼新書	劉昉、王曆、王湜等	紹興二十年（1150）	四明（浙江鄞縣）
3	雞峰普濟方	張銳 （亦有作張渙）	紹興年間	不詳
4	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	鄭春敷	隆興二年（1164）	不詳
5	活人書括	李先知	乾道二年（1166）	不詳
6	洪氏集驗方	洪遵	乾道六年（1170）	姑孰郡
7	傷寒要旨、藥方	李檉	乾道七年（1171）	姑孰郡
8	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陳言	淳熙元年（1174）	不詳
9	醫經正本	程迥	淳熙四年（1177）	不詳
10	楊氏家藏方	楊倓	淳熙五年（1178）	當塗（安徽）
			淳熙十二年（1185）	閩（福建）
11	續易簡方論	盧祖常	不詳	不詳
12	陸氏集驗方 續集驗方	陸游	淳熙七年（1180）	江西倉司 （民為心齋）
13	衛生家寶方	朱肱	淳熙十一年（1184）	南康郡（江西）
14	葉氏錄驗方	葉大廉	淳熙十三年（1186）	龍舒郡
			慶元二年（1196）	沔陽郡
15	本草單方	不詳	紹熙二年（1191）	四明（浙江）
16	集驗背疽方	李迅	慶元二年（1196）	不詳
17	備全古今十便良方	郭坦	慶元二年（1196）	不詳
18	百一選方	王璆	慶元二年（1196）	湖北古沔
19	方氏集要方	方導	慶元三年（1197）	不詳
20	學脈指要	章謙	嘉泰二年（1202）	不詳
21	傷寒明理論（傷寒）	（金）成無己	開禧元年（1205）	不詳
22	傷寒活人書 （南陽活人書）	朱肱	不詳	不詳
23	增釋南陽活人書	王作肅	不詳	不詳



24	醫說	張杲	淳熙十六年(1189)	不詳
			嘉定十七年(1224)	不詳
			寶慶三年(1227) 紹定改年(1228)	不詳
25	外科新書	伍起予	開禧三年(1207)	不詳
26	重刻證類本草	唐慎微	嘉定四年(1211)	初刻於江西 南隆郡 東梓郡
27	究源方	張松	嘉定六年(1213)	不詳
28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不詳	嘉定年間	行在(臨安)大醫局
29	鍼灸資生經	王叔權	嘉定十三年(1220)	海陵
			紹定四年(1231)	澧陽
30	女科百問	齊仲甫	嘉定十三年(1220)	行在(臨安)大醫局
31	張氏手試方	張興祖	不詳	不詳
32	脉粹	處厚	嘉定十六年(1223)	不詳
33	備急灸法	聞人耆年	寶慶二年(1226)	不詳
34	小兒痘疹論	聞人規	紹定五年(1232)	浙西
			端平二年(1235)	不詳
35	婦人大全良方	陳自明	嘉熙元年(1237)	福建
36	察病指南	施發	淳祐元年(1241)	不詳
37	續易簡方論	施發	淳祐三年(1243)	不詳
38	濟生方	嚴用和	寶祐元年(1253)	不詳
39	外科精要	陳自明	景定四年(1263)	福建
40	楊氏仁齋直指方論	楊士瀛	景定五年(1264)	不詳
41	女科濟陰要語萬金方	鄭仲饒	咸淳元年(1265)	不詳
42	類編朱氏集驗醫方序	朱佐	咸淳二年(1266)	不詳
43	嚴氏濟生續方	嚴用和	咸淳三年(1267)	不詳
44	新大成醫方	王元福	咸淳三年(1267)	不詳
45	黃帝八十一難經註義圖	李駟	咸淳五年(1269)	不詳
46	梁宰觀經驗良方序	梁觀	不詳	不詳
47	費茂卿方書	費茂卿	不詳	不詳
48	備急管見大全良方	陳自明	咸淳七年(1271)	福建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宋) 毛晃，《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宋嘉定十六年國子監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王栐，《燕翼詒謀錄》，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宋) 朱熹，《楚辭集注》，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宋) 施發，《察病指南》，日本室町中期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寶祐五年湖州刊元明遞修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清雲間王陳梁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書目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68。
- (宋) 曾協，《雲莊集》五卷，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劉昉、王湜編，樓璣續編，《幼幼新書》，明萬曆十四年古吳陳氏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樓鑰，《攻媿集》一百十二卷，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宋) 歐陽德隆撰，郭守正增修，《紫雲先生增修校正押韻釋疑》，宋理宗年間建陽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宋) 嚴用和，《嚴氏濟生方》十卷，宋刊影鈔配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于敏中等編、彭元瑞續編，《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清嘉慶間內府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 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 (清) 趙翼，《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78。

### 二、近代論著

- 王國平，〈以杭州（臨安）為例還原一個真實的南宋——從「南海一號」沉船發現引發的思考〉，收入王勇、郭萬平等著，《南宋臨安對外交流》，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頁5-34。
- 朱迎平，《宋代刻書產業與文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年。
- 何忠禮，〈略論南宋的歷史地位〉，《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頁72-79。
- 吳哲夫，〈宋代圖書出版業——市場與版權〉，《故宮文物月刊》，第297期，2007年12月，

頁 102-109。

- 吳哲夫，〈宋代圖書出版業——品牌與行銷〉，《故宮文物月刊》，第 296 期，2007 年 11 月，頁 78-86。
- 尾崎康，〈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尾崎康，〈宋代雕版印刷的發展〉，《故宮學術季刊》，20 卷 4 期，2003 年，頁 167-190。
- 李子君，〈《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版本考述〉，《文獻》，2005 年第 4 期，頁 83-97。
- 李子君，〈《禮部韻略》在宋代的流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 年第 1 期，頁 92-97。
- 李明杰，〈宋代版本學研究——中國版本學的發展及形成〉，濟南：齊魯書社，2006。
- 李致忠，〈宋版書敘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李偉國，〈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李傳軍，〈南宋出版業的經營策略與文化傳播——以南宋臨安棚北大街睦親坊陳宅書鋪為中心〉，《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54 卷第 4 期，2009 年，頁 47-51。
- 李經緯，〈北宋皇帝與醫學〉，《中國科技史料》，第 10 卷第 3 期，1989 年，頁 3-20。
- 沈宗憲，〈近三十年來兩岸學者有關宋代文化史研究之回顧～以印刷圖書、文化交流為例〉，收入劉德美等主編，《史學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學術論文集》，臺北：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學術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出版，2009 年，頁 291-312。
- 周紹明 (Joseph. P. McDermott) 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昌彼得、吳哲夫，〈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 林拓，〈福建刻書業與區域文化格局關係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51-56。
- 徐楓，〈論宋代版權意識的形成和特徵〉，《南京大學學報》，1999 年第 3 期，頁 151-156。
- 祝尚書，〈論宋代的圖書盜版與版權保護〉，《文獻季刊》，2000 年第 1 期，頁 77-87。
-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成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8 年，頁 171-210。
- 張韶祁，〈論宋元兩代書賈的行銷策略——以《書林清話》、《書林餘話》內容為範圍〉，《書目季刊》，第 43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15-30。
- 陳元朋，〈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為之傳衍〉，收錄在《宋史研究集》，第 31 輯，頁 431-533。
-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陳先行，〈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360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程民生，〈宋代社會自由度評估〉，《史學月刊》，2009年第12期，頁27-40。

黃寬重，〈海峽兩岸宋史研究動向〉，《歷史研究》，1993年第3期，頁137-152。

劉子健，〈宋代考場弊端——兼論士風問題〉，載《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頁229-247。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匯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8。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載《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主編，1990，頁113-143。

鄭學寶、鄭洪，〈略論宋代醫學考試的特點〉，《中醫教育》，24卷5期，2005年，頁74-77。

鞏本棟，《宋集傳播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

顧宏義，〈宋代國子監刻書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4期，頁41-46。

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2。

## **The Market of Publishing and the Circulation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A Study on Publishing of Book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reatises of Medicine**

Hsu Yuan-ti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is considered a weakened regime after moving to the South, but the studies of Southern Song history demonstrate its unprecedented vitality on culture and arts. While the foreign troops ruined the North that caused political chaos and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was relatively steady, and thus the Southern Song later even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culture. It is undoubted that the region of Liangzhelu, where the capital Lin'an was, was especially the hear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Song. The credit for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activity of academic thoughts had to go to the use of paper and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technologies. Furthermore, knowledge was no longer limited to a few people owing to the popularity of publishing, and hence a culturally prosperous Song dynasty was formed. If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and societies,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enterprise that closely relates to cultural policies is a significant criterion for examining it.

Studies on publish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often discuss issues of editions, collation, contents, binding, and so forth. Recently, with the influences and strikes of the trend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scholars start to study issues on publishing of the Southern Song from diverse angles. For instance, they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woodblock printing industries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of commerce, the spread and circulation of Song books based 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ssues on books, intellectual circles, regional communities, and awareness of copy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history.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early scholarship, hence, the present paper, by using both records in anthologies and bibliographies, examines the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editions and reviews textual sources on publishing, including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writings, reading notes by

literati, the *Manuscript of Song Compendium*, and the *Complete Prose of the Song*. Among all, two specific types of books, namely, book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reatises of medicine, more in quantity, are selected in this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s and markets of publish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period and its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culture of publishing, circulation of books, book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treatises of medic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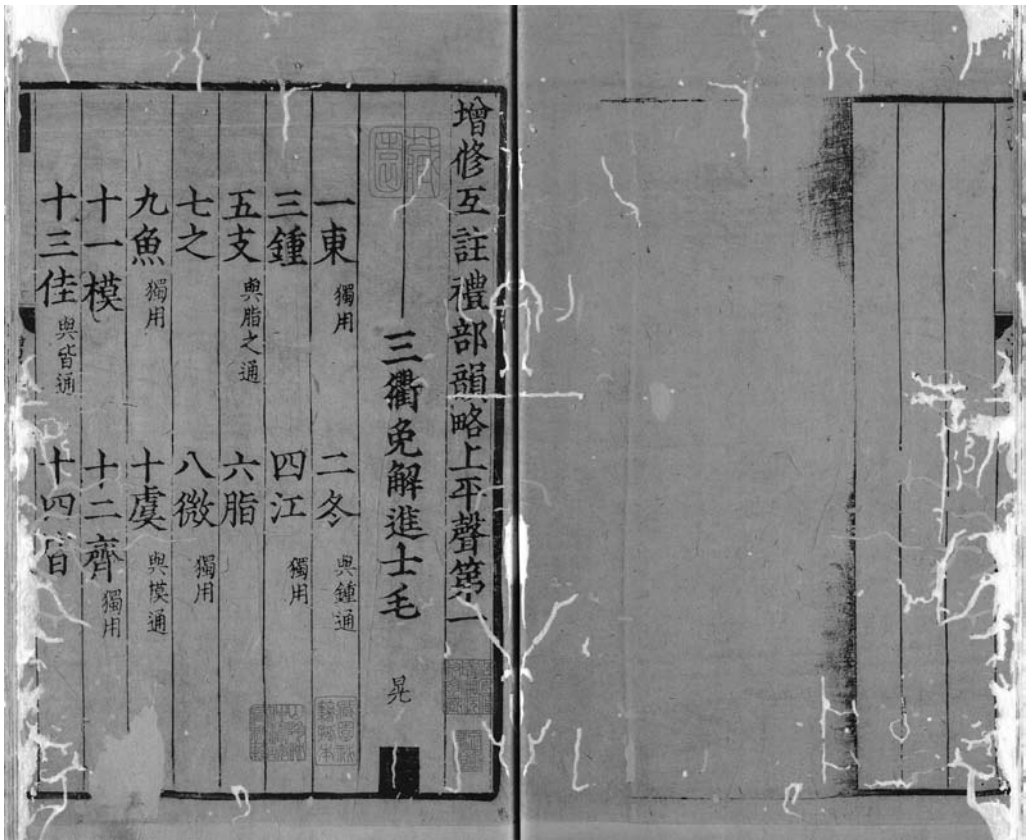


圖1 宋 毛晃、毛居正父子進呈《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南宋國子監刊本 28.2X19.6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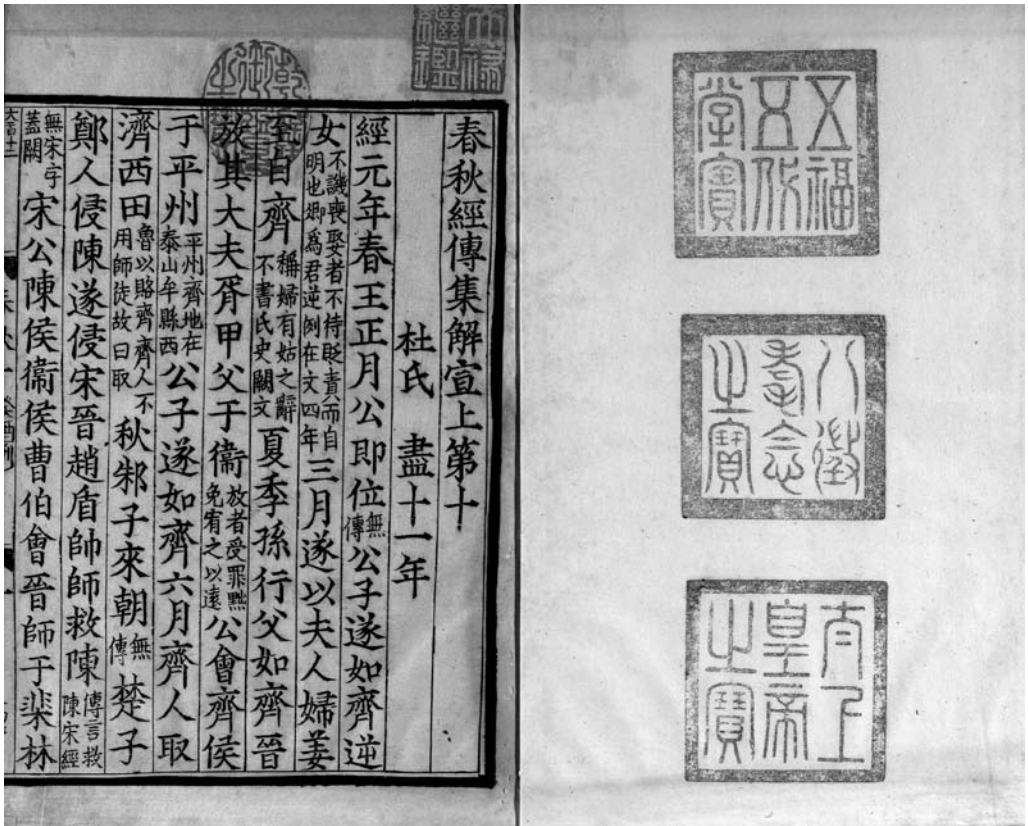


圖2 《春秋經傳集解》存二十七卷 宋淳熙間撫州（今江西）公使庫刊配補乾道間江陰邵本及明覆相臺岳氏本 21.4X15.3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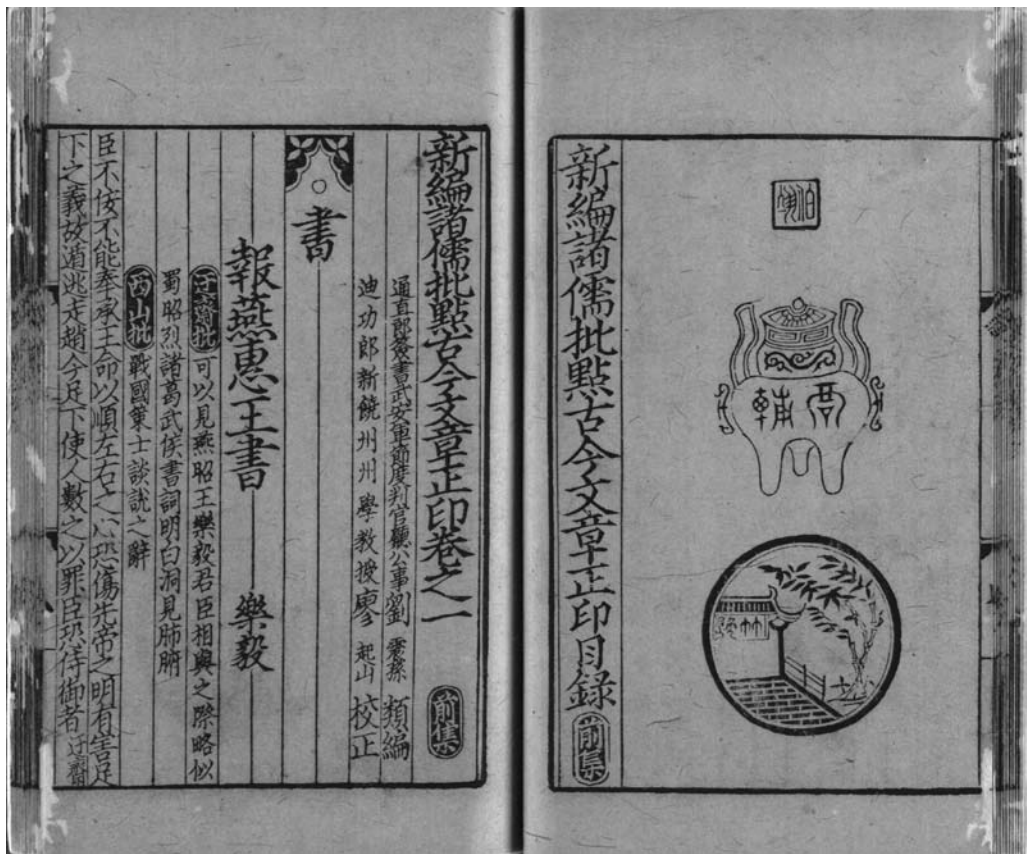


圖5 宋 劉震孫編《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宋咸淳間刊本 15.2X10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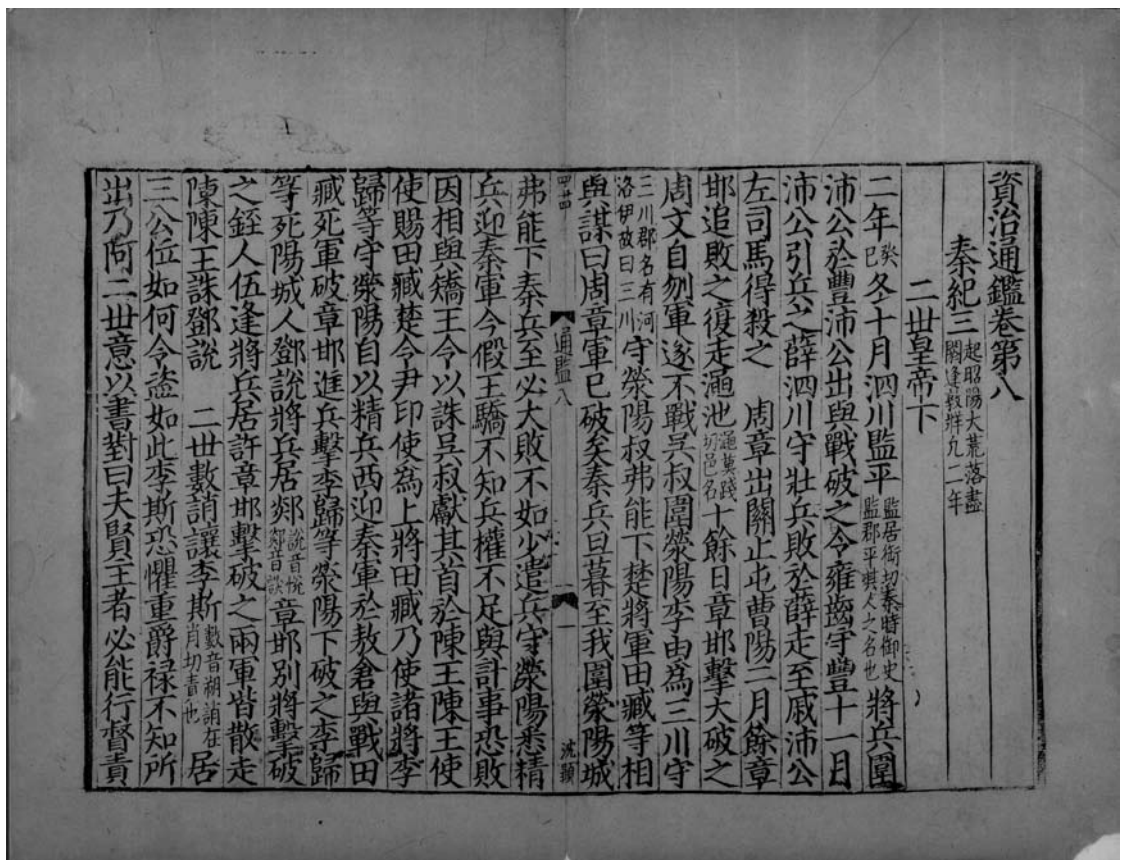


圖6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宋鄂州覆刊龍爪本 25.2X18.2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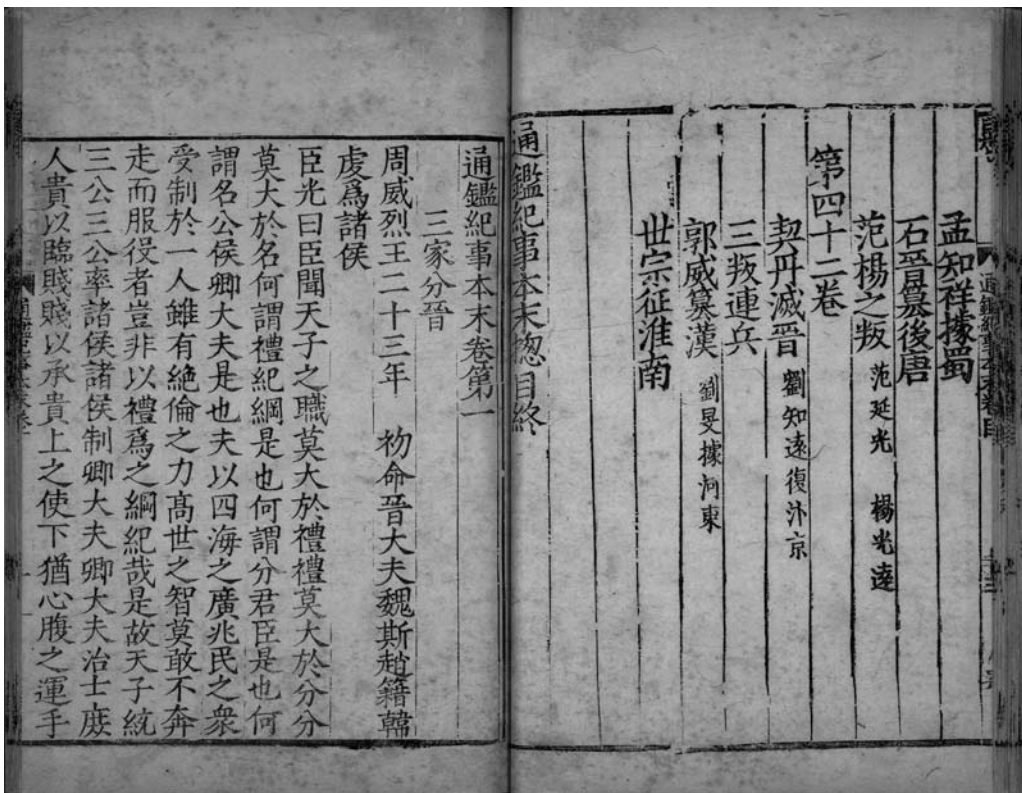


圖7 宋 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宋寶祐五年湖州刊本 25X19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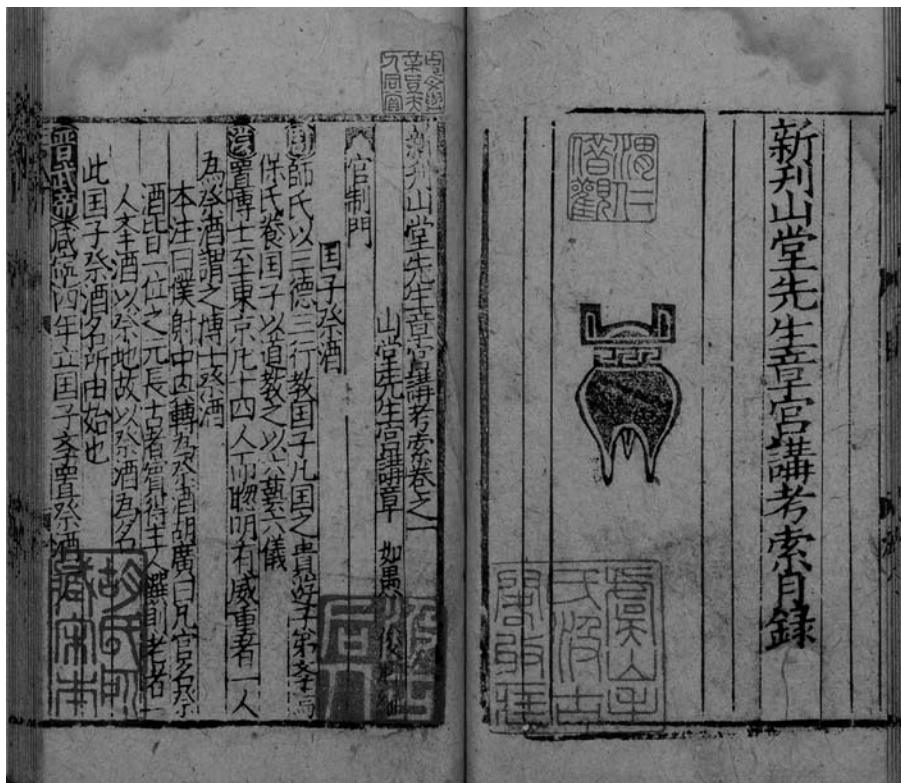


圖8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存官制門一集十卷 宋刊巾箱本 10.2X6.5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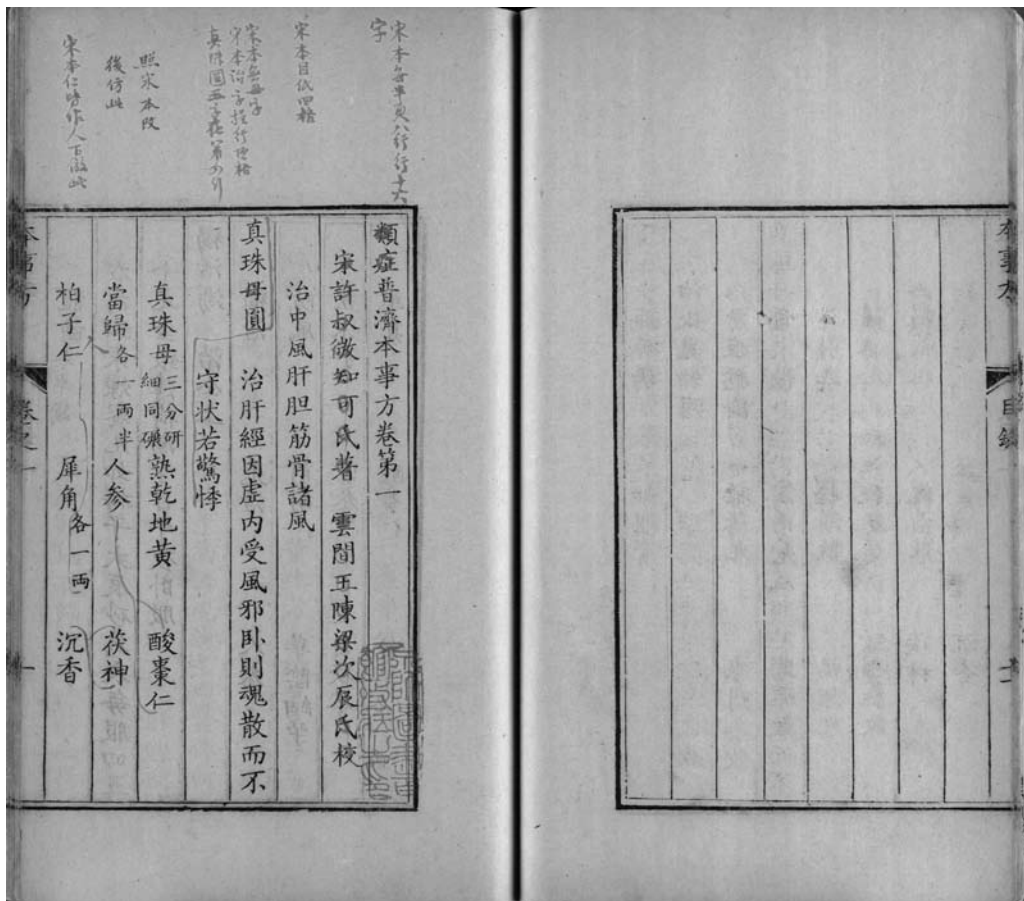


圖11 宋 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清雲間王陳梁刊本 19X12.5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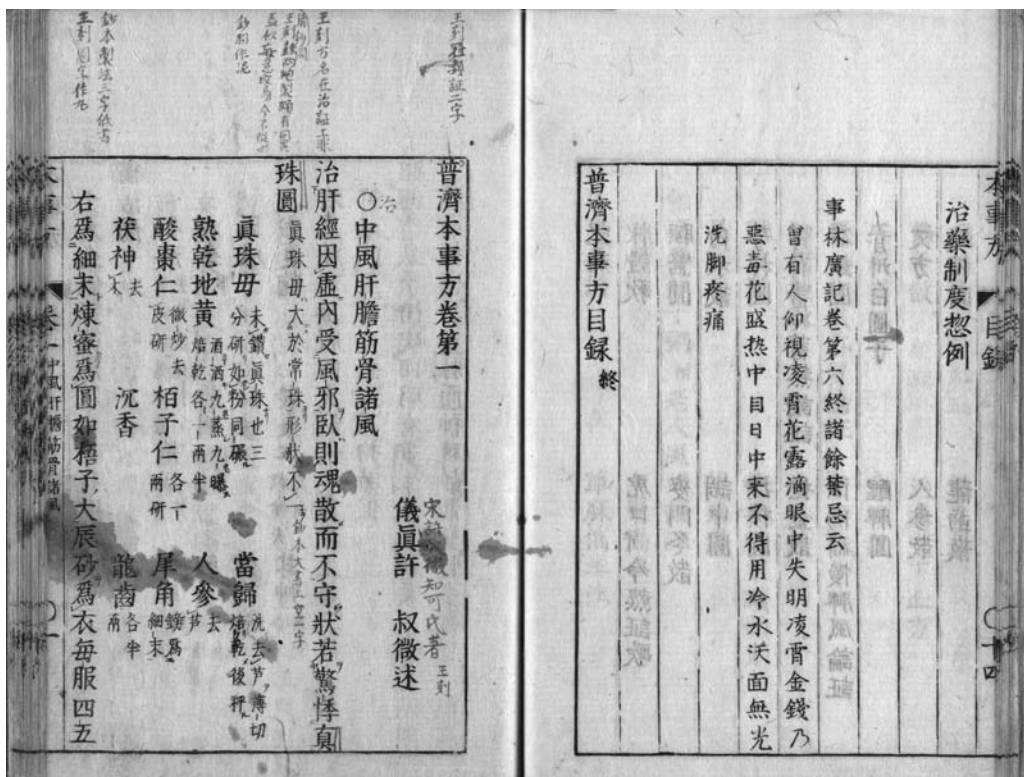


圖12 宋 許叔微《類證普濟本事方》日本享保二十一年（1736）大阪書肆刊本 19.5X13.5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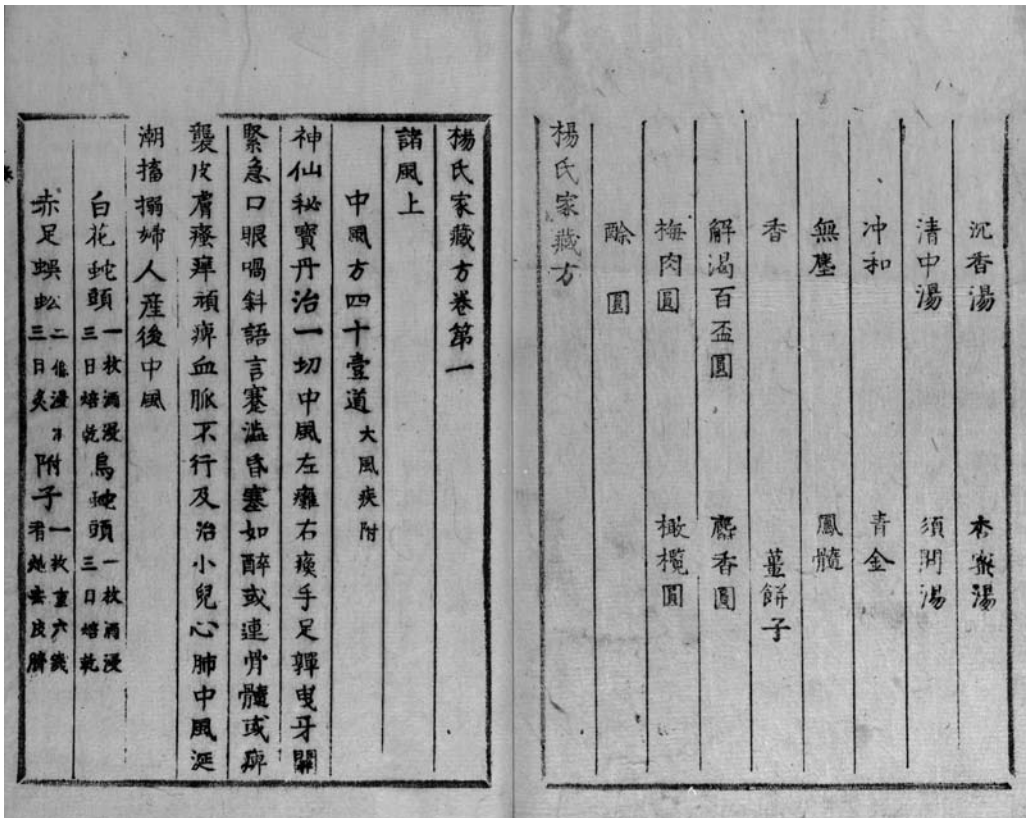


圖13 宋 楊傑《楊氏家藏方》日本安永六年(1777)活字本 21X15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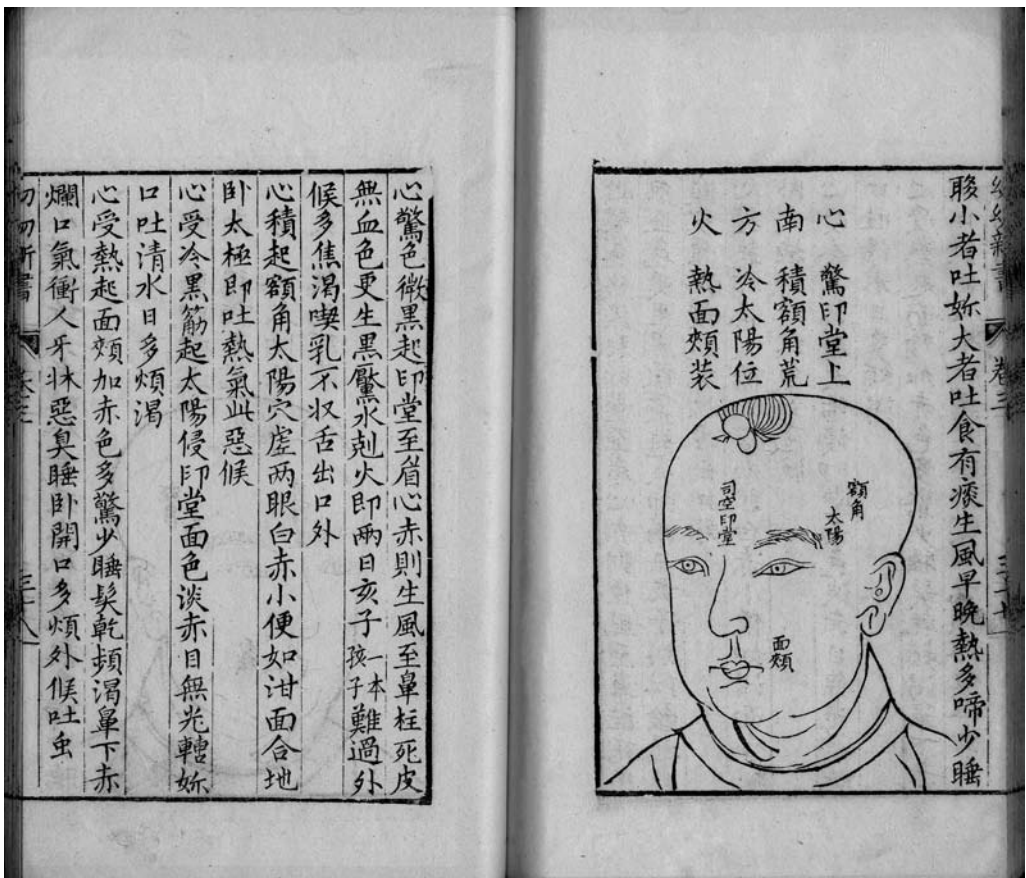


圖14 宋 劉昉、王曆、王湜編《幼幼新書》明萬曆十四年古吳陳氏刊本 21X13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然可觀。庶幾病者隨索隨見。隨試隨愈。僕  
 於此編。非敢求異昔人也。蓋亦補其偏。而會  
 其全。聚於散。而斂於約。期決無憾云。愚者  
 千慮。必有一得。君子毋以人廢言。昔嘉熙  
 元年八月良日。建康府明道書院醫諭  
 臨川陳自明良父序。

新編婦人大全良方綱目

凡八門

調經門	凡經醫以人為先初須
象疾門	生經故不調之疾
求嗣門	求疾既無次須之知
胎教門	胎求胎教已明次須之知
妊娠門	妊娠病已明次須之知
坐月門	坐月病已明次須之知
產難門	產坐難月病已明次須之知
產後門	產後難月病已明次須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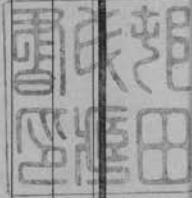


圖15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 日本傳鈔朝鮮活字本 20.1X15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